

# 《大集经》与地论学派

——以判教为中心

圣凯



中国佛学的创造转化,是基于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,尤其是通过对一些主要经论的诠释,消化、融合印度佛教,完成佛教的中国化。五世纪初,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了《法华经》、《般若经》、《中论》等大乘经论;接着,昙无讖在凉州译出《涅槃经》,佛陀跋陀罗译出《华严经》,于是大乘经论已经充分地介绍到中国佛教界。于是,充分地吸收这些经论的思想,而且进行创造性的诠释,开创出中国大乘佛学的新思想,成为中土佛教界的时代课题。地论学派承继西晋、刘宋的佛教思想,在接受印度初期瑜伽行派的思想过程中,融合中印佛教思想,通过地论师的不断努力,形成丰富的中国佛教思想。

慧光以后的地论学派,随着师资相授,佛陀三藏、慧光的判教思想亦得到继承;同时,地论师依自己的

思想以及立场,亦会对其他判教学说进行吸收,如昙遵、道凭都有所继承与不同的展开。于是,后期地论师的判教学说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局面:在渐顿圆三教判的基础上,重视《大集经》之流提倡“圆宗”,于是《华严经》与《大集经》得到结合;另外,“四宗判”开展成五宗、六宗,或者概括成声闻藏、菩萨藏。总而言之,后期地论师对判教的不断探讨,无疑刺激了天台智顗、净影慧远、嘉祥吉藏对判教学说的总结,为隋唐宗派佛教的形成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。

## 一、地论学派中《大集经》研习者

南道系的地论师,主要是以传习《什地经论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涅槃经》为主。但是,南道系的一流出现尊崇《大集经》的现象,而且将《大集经》提到与《华严经》相同的高度,成为地论学派南道系的特殊现象。

北凉昙无讖译出《大集经》<sup>[1]</sup>后,在当时的北方广泛流行。《大集经》广说诸修行法门,尤其是演说禅法,重视神通;在思想上,以般若性空、中观实相为宗旨,同时掺入密教色彩与末法思想。《大集经》还反映了印巴次大陆的医学、星宿学和历日法等,体现此经思想的夹杂性。

在初唐以前,弘扬《大集经》的高僧,依《续高僧传》有如下:

昙鸾(476—542),“读《大集经》,恨其词义深密,难以开悟,因而注解。文言过半,便感气疾”<sup>[2]</sup>。昙鸾学习“四论”后,一直欲注解《大集经》,为求长生,从道士陶弘景学习仙术,后来遇菩提流支授与《观无量寿经》,于是著《往生论注》。

慧勇(515—583),“讲《华严》、《涅槃》、《楞伽》等大集》、《大品》各二十遍,《智论》、《中》、《百》、《十二门》论各三十五遍”<sup>[3]</sup>。慧勇就龙光寺之僧绰、建元寺之法宠,习学《毗婆沙论》;从僧诠学习三论。

宝象(512—561),著《大集经疏》,“初至虚空藏品,于义不达,闭目思之,不觉身上空中,离床三四尺许。欻然大悟,竟文慧发”。宝象对《大集经》有特殊的体验,而且“钞集医方,疗诸疾苦”,制《涅槃经》、《法华

经》等疏。<sup>[4]</sup>

安廩(507—583),曾为陈文帝讲《大集经》。在出家前,“制《入神书》一首、《洞历》三卷”,“性好老庄,早达经史。又善太一之能,并解孙吴之术”<sup>[5]</sup>。安廩是慧光的弟子,曾入南朝。

灵裕(518—605),著《大集经疏》八卷,而且还有《医决符禁法文》、《断水虫序》、《卜书》等俗书。

玄琬(562—636),十五岁从县延出家,受具足戒后就洪遵学四分律,复依县迁稟学《摄大乘论》,“《法华》、《大集》、《楞伽》、《胜鬘》、《地持论》、《中》、《百》等并资承茂矣”。<sup>[6]</sup>

法融(594—657),学习三论,讲《大集经》。牛头山的佛窟寺“有七藏经画:一、佛经,二、道书,三、佛经史,四、俗经史,五、医方图符”。法融阅读诸书八年,摘抄各书的精要。<sup>[7]</sup>

昙鸾、慧勇、玄琬、法融都曾学习三论,而宝象则以《成实论》著名,灵裕、安廩、宝象、玄琬则出自地论学派南道系,昙鸾则受菩提流支的教导。而且,昙鸾等人都具备非常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素养,与道家、儒家以及占卜、风水、医术、兵法 etc 等紧密联系,所以他们的思想与《大集经》有相通之处,或者说受到《大集经》的影响。<sup>[8]</sup>

在南北朝隋初时期,尊崇《大集经》的一流确实以地论学派南道系为主。在敦煌遗书中,保存有《大集经》注释的残卷 B.8378(腾 6)——《大乘五门实相论》,注释“不可说菩萨品 中间部分至‘宝幢分’的魔苦品、往古品、魔调伏品、相品”,各品注释的开头皆插入《大乘五门实相论》,这可能是《大集经》唯一现存的注释。而且,未发现对隋代插入的《虚空藏品》进行注释,推测这可能是隋以前成立的。<sup>[9]</sup>

在敦煌写本中,类似的写本还有《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》、《仁王般若实相论》。在《仁王般若实相论》中处处强调“无障碍”,这与地论学派重视《大集经》一流“无障碍”相通,因此是基于如来藏思想盛行《十地经论》研究的时代风潮中成立的,属于地论学派南道系的文献。<sup>[10]</sup>

同时,地论学派南道系尊重《大集经》的一流,不但在思想上重视“空”的思想,而且重视神通、陀罗尼、禅观。智顗在《次第禅门》“亦世间亦出世间禅”中,详细论述“通明观”,与《大集经》有紧密的联系:

此禅名为通明观者,此观方法出《大集经》文,无别名目。北国诸禅师修得此禅,欲以授人,既不知名字,正欲安根本禅里,而法相迥殊;若对十六特胜,则名目全不相关;若安之背舍、胜处,观行方法条然别异。既进退并不相应,所以诸师别作名目,名为通明观禅。或有说言:《华严经》有此名目。<sup>[11]</sup>

“通明观”的观法出自《大集经》卷二十二的一段文字:“憍陈如!法行比丘能得神通……是名不与凡夫共法,非是世法,是无学法。”<sup>[12]</sup>《大集经》论述了“通明观”的观法、支相,却无“通明观”之名目。当时北方禅师盛行此禅法,但不知名字,冠以“通明观”之名,恐怕是智顗的创见<sup>[13]</sup>。因为,慧思亦提起此观法,但亦无“通明观”的名称<sup>[14]</sup>。“通明观”的特色在于“观一达三”:观息、观色、观心,三事通观,故云:“从初修习即通观三事,若观息时即通照色、心,若观色乃至心亦如是。此法明净,能开心眼,无诸暗蔽。既观一达三,彻见无阂,故名通明。”<sup>[15]</sup>所以,“通明观”是依据《大集经》,接纳道教的存思法、汉代以来流行的五行观及伪经《黄帝内经》而熔铸为一独特的禅观。<sup>[16]</sup>

修习“通明观”的“北国诸禅师”应该与南道系有紧密联系,《大集经》研究伴随着《华严经》、《十地经论》研究的盛行而发展,从而出现尊重《大集经》的地论师一流,而且他们重视“无碍”的思想影响了华严学的发展。

## 二、三宗四宗与五宗六宗

慧光的“四宗判”,得到后代地论师的继承与发扬,于是出现三宗、四宗、五宗、六宗等种种判教。吉藏《大乘玄论》提及地论师持有“三宗”和“四宗”之说:

地论师:有三宗、四宗。三宗者,一、立相教,二、舍相教,三、显真实教。为二乘人说有相教;《大品》等经广明无相,故云舍相;《华严》等经名显真实教

门。四宗者，《毗昙》是因缘宗，《毗昙》谓假名宗，《仁论》名不真宗，《什地论》为真宗。<sup>[17]</sup>

地论师的“三宗”、“四宗”都是立足于慧光的“四宗判”，然后有所增减或修改。“三宗”分别是：(1)立相教：这是为二乘人所说的法，主要是剖析万法的性相；(2)舍相教：这是《大品般若经》的教理，阐明万法无相、本性是空；(3)显真实教：指《华严经》，显示最高的真理。所以，“三宗”是慧光的“四宗判”除去第二“假名宗”。而吉藏所提到“四宗”，与慧光的“四宗判”相似，只是改第四宗为“真宗”，以《什地论》为代表经论<sup>[18]</sup>。

但是，吉藏并未指出“四宗”判教的地论师，法藏《五教章》记载大衍法师建构“四宗”的判教体系：

依大衍法师等一时诸德立四宗教，以通收一代圣教：一、因缘宗，谓小乘萨婆多等部；二、假名宗，谓《毗昙》、《经部》等；三、不真宗，谓诸部《般若》，说即空理，明一切法不真实等；四、真实宗，谓《涅槃》、《华严》等，明佛性、法界、真理等。<sup>[19]</sup>

“大衍法师”即是慧光的弟子昙隐，他居住于北齐邺城的大衍寺。昙隐的“四宗”，与慧光的“四宗判”基本相同，可见他是继承其师之说。

而且，吉藏还提及地论师具有“五宗”判教<sup>[20]</sup>。智顗《法华玄义》举出护身寺自轨的“五宗”：“有师开五宗教，四义不异前，更指《华严》为法界宗，即护身自轨大乘所用也。”<sup>[21]</sup>《五教章》的解释较详：

依护身法师，立五种教：三种同前衍师等；第四名真实宗教，谓《涅槃》等经，名佛性、真理等；第五明法界宗，谓《华严》明法界自在无碍法门等。<sup>[22]</sup>

自轨的生平不详，应是地论师。自轨的“五宗”前三宗，与慧光、昙隐的“四宗”相同，但是将“四宗”的“真实宗”分开，《涅槃经》阐明佛性妙有为“真实宗”，而《华严经》明无碍法界为“法界宗”，这样，《华严经》置于《涅槃经》之上，成为“五宗”。

在南北朝佛教中，《法华经》无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。《法华经》以“一乘”引导人们走向成佛之道，“十如是”表现出存在论的统一性，吸收人们去探讨宗教与哲学的重要命题。地论学派虽然以《涅槃经》、《华

严经》为主要经典依据，但是仍然必须面对《法华经》，于是在判教理论中必须体现出《法华经》的地位与思想。所以，后期地论师在慧光的“四宗”判教中更提出“六宗”，智顗《法华玄义》说：

有人称：光统云四宗，有所不收，更开六宗。指《法华》万善同归，诸佛法久后，要当说真实，名为真宗。《大集》染净俱融，法界圆普，名为圆宗。余四宗如前。即是耆闍凖师所用。<sup>[23]</sup>

“耆闍凖”即是“安廩”，为慧光的门人。曾经到南朝，住钟山（今江苏省南京市东）耆闍寺，故名。安廩曾为陈文帝讲《大集经》，可见他是地论师中重视《大集经》的一流。安廩认为，慧光的“四宗判”未能收摄佛陀的所有教法，如《法华经》、《大集经》等，所以提出“六宗”。第五、“真宗”，这是指《法华经》，会三归一、开权显实，开示种种方便，最后归入最究竟的真实。第六、“圆宗”，即是《大集经》，融会染净的分别，显示法界为圆通无碍，普及群品。

依智顗的叙述，安廩的“六宗”是将大乘经论，依《华严经》、《涅槃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大集经》的次序排列，这无疑不符合地论学派尊重《华严经》的传统。所以，《五教章》的引述则有出入：

六、依耆闍法师，立六宗教：初二同衍师；第三名不真宗，明诸大乘通说诸法如幻化等；第四名真宗，明诸法真空理等；第五名常宗，明说真理恒沙功德常恒等义；第六名圆宗，明法界自在，缘起无碍，德用圆备，亦《华严》法门等是也。<sup>[24]</sup>

安廩的“六宗”中的“因缘宗”、“假名宗”，与慧光、昙隐的“四宗判”相同。第三、“不真宗”是阐明诸法为如幻如化，第四、“真宗”则为说明万法的本性是空，从思想上说，这是将慧光、昙隐的“四宗判”的“不真宗”分开为“不真宗”、“真宗”。第五、“常宗”说明如来藏、法身等真理具有无量恒河沙数的功德。第六、“圆宗”是说明法界缘起自在无碍，万德圆备具足，亦是《华严经》所彰显的法门。安廩是将“四宗判”的“真宗”分为“常宗”、“圆宗”，其中“圆宗”应该是指《大集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。

总而言之,安廩的“六宗”判教依智顗、法藏的记载,疑点颇多。虽然,后来澄观、慧苑等都以华严宗的判教进行解释,但已经远离地论学派的判教传统,不能正确理解安廩的“六宗”,所以必须借助地论学派的其他判教理论进行解释,尤其是重视《大集经》的一流。

### 三、圆中之圆与圆中之顿

在地论学派南道系中,出现尊重《大集经》的一流。于是,《大集经》的判教成为判教的中心。智顗《法华玄义》曾指出安廩主张《大集经》“为染净俱融,法界圆普”,所以为“圆宗”。在地论学派中,安廩、灵裕、宝象、玄琬都是《大集经》的研习者,但是这些人的著作皆未能存世。在敦煌遗书中,发现地论学派的珍贵文献。如S613V《纲要书》,《敦煌宝藏》拟题为《佛经疏释》,主要是关于佛教法义的讨论,具有“义章”的特点。S613V《纲要书》说:

三教行相:夫如来大圣,所以兴于世者,将欲以己所得传示众生故也。然其所得,教别尘沙,岂容限目!如约以辨一代始终,要不出三。其三者何?一是三乘别教,二是通教,三是通宗教。言别教者,谓《毗昙》、《毘婆沙》所辨疏论者是;言通教者,如《法华》,会三归一者是;言通宗教者,谓《涅槃》、《华严》、《大集》,所辨体状者是。前言通者,相融故通;今之辨通,体融故通。然究之体实,旨明教一,圆音不二为宗。所契平等,体真一味,理唯如如,岂容异哉!但随根上下,别其浅深,寄言于三耳。又就别教<sup>[25]</sup>之中,具辨法界理教行法及以一切,但唯在事耳。通教之中,备明法界,但唯论其相也。就其通宗,所辨法界唯据体实,以明此旨难晓,宜释前同异。寄以显示何者?欲明前之别教宣明指月,舍相以标;通教辨唯据相,返诠而显悟;其通宗要是返而彰。……一体一切体。……言一体即是《华严》,一切体即是《涅槃》,体无不彰即是《大集》。然《涅槃》据相,明渐教行,是有余无余;《华严》就体,辨顿圆教行,是必竟不必竟;《大集》据无障碍,以彰圆教行,是秘密。盖是顿以辨渐,

差别而无差别;即渐以明顿,无差别之差别。差别无差别,如因陀罗网;融同无碍者,宁非圆穷之实哉!<sup>[26]</sup>

S613V《纲要书》的判教思想继承了佛陀三藏的“三教判”,而且明确指出三教的经论。“三乘别教”是小乘的教理,以《阿毗昙》、《毘婆沙》为主;“通教”是《法华经》,阐明会三归一的思想;在“通宗”中,《涅槃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大集经》都包含于其中。S613V《纲要书》将《法华经》界定为“通教”,而且明确指出《涅槃经》等三经为“通宗”,这是佛陀三藏的“三教判”发展,与安廩的“六宗判”有相似之处。如智顗《法华文句》说:“地人呼《华严》为圆宗,《法华》为不真宗。<sup>[27]</sup>“不真宗”即是“通教”,可见S613V《纲要书》确实是地论师的著作。

总结S613V《纲要书》的判教,图示如下:

别教——《毗昙》、《毘婆沙》  
通教——《法华》  
通宗——《涅槃》——渐教  
《华严》——顿教  
《大集》——圆教

S613V《纲要书》的判教思想,分为两种层次:一、就“三教”的差别而言,“别教”对真理的阐发与实践等,都是在“事”的层面,诠释的方法是“指月舍相”,即通过阐明诸法的差别而舍弃对诸法的执著;“通教”依“相”而诠释法界,最后显示悟证的境界;“通宗”依“体”而阐释法界的体性。二、就“通宗”而言,依法界体性的最高真理而言,所有教法都是同一的,都是“圆音不二”;而且,从修道者的证悟来说,所证入的真理之体是一味平等无差别,真理是本然如是。但是,随众生的根机深浅,于是有渐、顿、圆的差别。这样的解释,无疑具有菩提流支“一音教”的特点。但是,S613V《纲要书》并不停留于菩提流支对大乘经论的“等质性”,而是在大乘经典中判别浅深次第。从最高真理的诠释与实践而言,《华严经》是“顿”时彰显唯一体性,圆满法身法界即是华藏世界海,从实践上则属于“顿圆教行”,从证悟上则有究竟与不究竟的差别;《涅槃经》是“渐”次阐明诸法的各自体性,因此必须修渐教行,证



入的涅槃存在“有余”与“无余”的不同;《大集经》是依体相圆融无障碍而彰显圆教行。所以,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地论师依“体”、“相”、“用”而诠释大乘教理。“体用”问题在地论师时代,逐渐成为诠释的核心。

《大集经》之所以置于判教系统的最高位置,S.613V《纲要书》指出:“十地圆道……杂染实者,染净斯融也。……德行满足,是名之为圆也。”<sup>[28]</sup>《大集经》阐明十地菩萨的最高境界,圆融杂染与清净,具足功德万行,因此称为“圆宗”。《大集经》的研究与《十地经论》、《华严经》的密切结合,主要在于北方佛教重视修禅<sup>[29]</sup>。所以,《大集经》引起地论学派以及四论学派的重视,如吉藏《华严游意》说:“二佛同明因果,各有差别无差别、无差别差别义。”<sup>[30]</sup>这与S.613V《纲要书》所说“差别无差别”非常相似,可见《大集经》对南北朝佛教的影响。

而且,S.6388《胜鬘经疏》<sup>[31]</sup>的判教思想,与S.613V《纲要书》非常一致:

今并信未久者,悟圆教之宗在始,故曰未久。就圆宗之中,略明三种相:《涅槃》等是渐中之圆;《华严》等是顿中之圆;《胜鬘》等是圆中之圆,《大集》之流故也。是以《涅槃》以自类因果为宗,《华严》以自种因果为宗,《大集》等以自体因果为宗。然宗各备三,欲别三者,互举一宗耳。<sup>[32]</sup>

S.6388《胜鬘经疏》将“通宗”称为“圆宗”,在“圆宗”之中,《涅槃经》是属于“渐中之圆”,《华严经》是“顿中之圆”,《胜鬘经》、《大集经》是“圆中之圆”,而且三经所明因果亦不同。类似的判教,亦见于B.6616(闰76)《涅槃经疏》。<sup>[33]</sup>

依判教方法,“渐教”衍成“渐中之渐”、“渐中之顿”、“渐中之圆”;“顿教”衍成“顿中之渐”、“顿中之顿”、“顿中之圆”;“圆教”即有“圆中之渐”、“圆中之顿”、“圆中之圆”<sup>[34]</sup>。这种判教方式在当时北方佛教界盛行,《法华玄义》提到“《华严》圆顿之教,解宗不同”<sup>[35]</sup>,“若约法被缘,名渐圆教”<sup>[36]</sup>,所以存在以“圆顿”、“渐圆”判别《华严经》的情形。而且,《法华玄义》以“渐圆”、“圆渐”、“渐渐”、“圆圆”加以剖析、解释,后

来《摩诃止观》的“四种止观”中使用了“渐渐”、“渐圆”、“圆渐”、“圆圆”<sup>[37]</sup>。可见,天台智顗对“圆教”及其“圆顿止观”的理解,受到地论师的影响。

S.613V《纲要书》、S.6388《胜鬘经疏》、B.6616(闰76)《涅槃经疏》等地论学派的敦煌文献,属于重视《大集经》一流。此系的判教思想是将佛陀三藏的“三教判”与慧光的“顿渐圆”进行融合,将“顿渐圆”摄入“通宗大乘”,而且三教衍生、匹配,出现“圆圆”、“圆渐”等判教方式。

#### 四、结 语

地论学派自从菩提流支、慧光之后,以前因为文献的散佚,皆以法上—慧远为中心进行考察。随着散佚文献,尤其是敦煌卷子中的地论师著作的发现,为我们深入探讨地论学派提供了宽广的视野。地论学派在发展过程中,对主要经论的诠释,出现重视《大集经》的一流,于是“四宗判”开始分化成五宗、六宗;而且,融合“顿渐圆”三教判和“别教、通教、通宗”三教判,将“顿渐圆”摄入“通宗大乘”,出现“圆圆”、“圆渐”等判教方式。S.613V《纲要书》、S.6388《胜鬘经疏》、B.6616(闰76)《涅槃经疏》等敦煌文献,皆体现了地论师学派重视《大集经》的现象。

对于地论学派对隋唐宗派佛教的影响,我们发现重视《大集经》一流的地论师,真正影响了天台智顗、华严智俨等人的思想,为探讨隋唐宗派佛教的形成,提供了全新的视角。

#### 【注 释】

[1] 依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九的记载,《大集经》前后有三译:一、后汉支娄迦谶译《大方等大集经》三十卷;二、姚秦鸠摩罗什译,三十卷,或作四十卷;三、北凉昙无讖译,三十卷,或作二十七卷、二十九卷、三十一卷、四十卷。(《大正藏》第49卷,第84页上)《三藏记集》卷九《大集虚空藏无尽意三经记》:“祐寻旧录:《大集经》是晋安帝世天竺沙门昙摩讖于西凉州译出……更不见有异人别译。”(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63页上)因此,此经除昙无讖译本外,是否还有其他二译,值得怀疑。

[2] 《续高僧传》卷六《昙鸾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470页上。

[3] 《续高僧传》卷七《慧勇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478页中。

[4] 《续高僧传》卷八《宝象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486页下—487页上。

[5] 《续高僧传》卷七《安廩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480页中。

[6] 《续高僧传》卷二十二《玄琬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616页上。

[7] 《续高僧传》卷二十六《法融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604页中。

[8] 《大集经》与道教的关系，参考青木隆《次第法门における一、二の問題》，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》第38卷第1号，1989年，第223页。

[9] 石井公成《华严思想の研究》，东京：春秋社，1996年，第515页。

[10] 石井公成《华严思想の研究》，第516—517页。

[11] 《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》卷八，《大正藏》第46卷，第529页上。

[12] 《大方等大集经》卷二十二，《大正藏》第13卷，第160页下—161页下。

[13] 林惠胜《智者大师的禅法：以“通明观”为中心的论述》，《载大宗教与文化学报》第4期，2004年，第81页。

[14] 慧思与《大集经》的关系，见坂本广博《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与大集经》，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》第28卷第1号，1979年，第366—368页。

[15] 《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》卷八，《大正藏》第46卷，第529页上。

[16] 详细论述见林惠胜《智者大师的禅法——以“通明观”为中心的论述》一文。

[17] 《大乘玄论》卷五，《大正藏》第45卷，第63页下。

[18] 吉藏《中观论疏》卷一本：“如旧地论师等辨四宗义：谓《毗昙》云是因缘宗，《成实》为假名宗，《般若》教等为不真宗，《涅槃》教等名为真宗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42卷，第7页中）这是以《涅槃》等为代表经论。

[19] 《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45卷，第480页下。

[20] 《法华玄论》卷三：“北地诸地论师，明四宗、五宗等说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34卷，第384页下）《仁王般若经疏》卷上一：“十地论师四宗、五宗分佛教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33卷，第

315页中）

[21] 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卷十上，《大正藏》第33卷，第801页中。

[22] 《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45卷，第480页下。

[23] 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卷十上，《大正藏》第33卷，第801页中。

[24] 《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45卷，第480页下。

[25] “别教”，原写本为“教别”，今据意改。

[26] 《敦煌宝藏》第5册，第139页下—140页上。

[27] 《妙法莲华经文句》卷九上，《大正藏》第34卷，第125页下。

[28] 《敦煌宝藏》第5册，第138页下。

[29] 石井公成《华严思想の研究》，第513页。

[30] 《华严游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35卷，第11页下。

[31] 有关此写本的文献学考察，见古泉圆顺《敦煌出土佛典注释書の“圆宗”》，《BU四天王寺国际佛教大学文学部纪要》第15号，1983年，第38—39页。

[32] 《敦煌宝藏》第45册，第656页下。

[33] B.6616(闰76)《涅槃经疏》：“今略明经教不同，如似《大集》等经是圆教，《华严》等是顿教，《涅槃》是渐教。虽等大乘，显义不同。”（《敦煌宝藏》第100册，第615页下。）

[34] 古泉圆顺《敦煌出土佛典注释書の“圆宗”》，《BU四天王寺国际佛教大学文学部纪要》第15号，1983年，第42页。

[35] 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卷九下，《大正藏》第33卷，第795页中。

[36] 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卷一上，《大正藏》第33卷，第683页下。

[37] 《摩诃止观》卷三下：“复次，四种止观当分圆渐。三藏中有从初心方便来入真位，此名为渐；三十四心断结成果，岂不名圆？通别中初心乃至后心，岂无渐圆？圆中当体理极称圆，亦有初心乃至四十一地，岂不是渐？妙觉究竟，岂不是圆？圆圆非渐圆，圆渐非渐渐，故知当分皆具二义也，《法华疏》中应广说。然渐渐非圆渐，可得成圆渐；渐圆非圆圆，不可得成圆圆。何者？《法华》云：‘汝等所行是菩萨道。’故渐渐成圆渐。渐圆权设三教之果，不可更成妙觉之佛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46卷，第33页下）